一、高山峡谷独龙家

大自然的鬼斧神功.在中国云南省西北山脉纵谷地带，形成三山(担当力卡山、高黎贡山、碧罗雪山)耸立、三江(怒江、澜沧江、独龙江）并流的独特的世界奇观——东方大峡谷。在大峡谷北端的深幽处，坐落着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贡山县位于云南西北部，地处东经 98°～98°4′、北纬 27°～28°3′之间。东西横距约 60 公里，南北纵距约 160 余公里，国境线长 172 公里。它北连深邃高耸的西藏高原，东接嵯峨峻秀的高黎贡山，西界南北逶迤的担当力卡山与缅印毗邻，南与福贡县接壤。全县总面积为 4 506 平方公里，下辖一镇四乡。独龙族就聚居在自治县其中的一个乡，这个乡所在地就是独龙江河谷。

独龙族自称“独龙”，他称有“俅人”、“俅子”、“曲人”、“俅帕”、“洛”、“曲洛”等，人口共有 5825 人（1990 年人口普查数），90%居住在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此外，在维西县齐乐乡的“俅扒卡”村还有 30 多户独龙族，这是唯一的居住在澜沧江边的一部分独龙族。独龙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独龙语和景颇语、傈僳语、珞巴语较接近，属同一语支。贡山怒语与独龙语基本相通。据有关语言学家调查研究表明，独龙江流域北连藏语区，东接彝语支区，南部和缅甸毗邻，西面是喜马拉雅山区诸语言，由于这个地区长期与世隔绝，受外界影响小，语言发展缓慢，保留早期面貌多，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藏缅语“活化石”的特征。原无文字，解放后，制定了拉丁字母《独龙文字方案》，现已在独龙族聚居的小学推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1950 年前,一些历史文献,如《云南志》(唐樊绰撰)、《元一统志》、清道光《云南通志》等,都对独龙族社会历史有所记载。经过有关专家学者长期研究表明,大约从公元 8 世纪起,独龙族先后受“南诏”“大理”云南地方政权的管辖。元明以后属丽江木氏土司统治。17 世纪以来陆续又受维西厅、康普和叶枝土司、察瓦龙藏族土司和喇嘛寺的统治。辛亥革命后,建立了菖蒲桶(贡山)、上帕(福贡)、知子罗(碧江)等三个“殖边公署”,以后又改为设治局,直至新中国建立。

在过去,独龙族由于受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加之地处边陲,山高谷狭,环境艰险,交通十分闭塞,经济文化极为贫穷落后,独龙族长期处于刀耕火种、穴居、食不裹腹、树叶为衣的原始状态,至解放前夕,独龙族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父系家族公社解体的历史阶段。值得庆幸的是,作为一个历史上长期受外民族欺凌盘剥的弱小民族,在如此艰苦环境中,能够生存下来并得以发展,而且在生存与发展中还能保留许多具有浓郁原始社会文化极为独特珍贵的历史遗存,实在令人敬佩。他们这些与大自然息息相关,并从其中获取物质与文化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生存方式及其所奠定的特殊的社会文化遗产,是今天我们从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研究不可多得的宝贵精神财富。

贡山境内,是著名的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由于南北暖寒气流交汇与河谷到山巅热、温、寒立体气候作用的效应,使北方的动植物能沿高寒山脊向南渗透,南方的动植物也能沿暖湿河谷向北分布。因此,这一带一向被称为我国南北动植物交汇的“十字路口”,既是“珍禽异兽的乐园”,也是第四纪冰川后至今尚存的古原生物保存的“避难所”。在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编的《中国生物多样性》一书中称其为“具有世界意义的陆地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和重要标本模式产地,其地学上的独特性和生物学上的保护作用是我国最重要、最理想的保护区”。据中国科学院昆明动、植物研究

所考察表明，在茂密的原始森林中，栖息着各种珍禽异兽一百七十多种,有虎、豹、熊、鹿、野牛、苏门羚、扭角羚、野猫、猕猴、大灵猫、小熊猫、马麝等，江边及沟谷有水獭以及稀有的白尾稍红鸡、夹斑角鸡、血鸡、白鹇等，扭角羚和大熊猫均为古代原始生物的“活化石”，在科学上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深山密林中还出产各种名贵药材,有黄连、贝母、虫草、天麻、厚朴、珠子参等,动物体内的名贵药物有麝香、鹿茸、熊胆、朱砂、牛黄等。

在三江流域和三山并立的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矿物资源，地质学家称之为‘三江成矿带”,其中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藏品种之多,储量之丰,在全省乃至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三条大江及其诸多大小支流，由于天然落差大，形成了得天独厚的、丰富的水利资源，有计划地科学规划与充分利用，将为祖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潜力巨大的能源。

早已驰名海内外的贡山天然大理石，储量达十多亿立方米，其中“贡翠”“羊脂玉”仅贡山独有,属稀有品种。由于这种大理石结晶细密、石质坚固、图案别致、花纹鲜艳,很受中外客商欢迎,大量投产后，必将为繁荣边疆民族经济，扩大商品出口作出贡献。

这里无处不是花卉的世界、珍稀植物的海洋，仅独龙江两岸就生长着亚热带至寒带的各种植物达两千多种，其中珍贵树种有秃杉、榧木、红豆杉、楠木、大树杜鹃、冷杉、铁杉、树蕨、董棕及光叶珙桐等。花卉品种达二百五十多种，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杜鹃花树，生长最为集中,有七十二个品种。春夏之际,各色杜鹃花开放,万紫千红,色彩缤纷,娇艳悦目,如霞似锦,真不愧是神奇山谷里天然的大花园。

这里还拥有开发潜力巨大的旅游资源：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景观，千峰万壑的高山峡谷地貌，绚丽多彩的生物物种和变化多端的自然气候带谱，造就喜玛拉雅山系隆起与凹陷形成断裂与褶皱

带的恢宏气势。那高悬于独龙江上空、体现独龙先辈战胜江河险阻的原始溜索与藤桥，将成为现代游人寻求惊险刺激体验的“空中索道”那些飞瀑流泉、云海浮山、翠竹绿林、花波彩浪缀合成的原始高山峡谷的独特景观，更使古朴神秘的独龙河谷平添一幅幅世外仙境般的奥奇壮美；那散布于高山峻岭一处处独龙先辈们用智慧和勇敢抗争毒蛇猛兽留下的“巢居”与洞穴遗址，将为游人提供寻古探幽、激发联想的诱人去处，还有那‘剽牛祭天”等原始古朴的独龙风情等等，都将是吸引那些祈盼回归大自然、寻味原始遗风、徒步探险、科考、采风游人的理想去处。

历史上这里又是缅、印和中国藏、滇之间的重要通道，战略位置极为险要，久为帝国主义列强所觊觎。自 1869 年至 1926 年，来自美、英、法等国的殖民主义者，以传教、探险和考察为幌子，先后约 50 人次到这一地区进行探察和测量，企图掠夺这里的资源和打通侵入我国腹地的通道，屡屡都遭到独龙族人民联合其他民族兄弟机智勇敢的斗争与反抗。独龙英雄普纳木松率众严惩英国侵略军先遣队头目布里查就是一例。

这里，以其典型的高山峡谷地貌，复杂的地质背景，活跃的新构造运动，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具魅力的人文要素，构成了独特的自然和人文要素密切耦合的人地复合系统，既是生物多样化的中心舞台，又是研究青藏高原隆起和横断山形成的关键地区，既是研究多种动植物共生、汇集和种属演化替代的重要地理区位，又是少受外界干扰，保有较多原始遗存，一向为地学、生物学、植物学、人类学和民族学家们十分向往和从事实地研究的理想场所。

建国四十多年来，党和政府多次派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工作者，不断深入独龙族地区从事社会文化与自然生态等方面的科学考察，先后出版了一批对认识独龙族社会“族情”与生态环境很有参考价值的读物、电影和电视专题片(如《通往独龙江的路》、《剽牛祭天》、《绿色峡谷》以及《东方大峡谷——独龙篇》等)，为党和政

府在不同时期制定对独龙地区的一些特殊政策，提供了很有参考价值的决策依据。从而，为独龙地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搞好多民族的团结发展，开发多种资源以及脱贫致富奔小康等，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97 年 11 月，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举行建县 40 周年庆祝活动，国家民委、云南省民委和怒江州政府以及毗邻的兄弟自治州、县都派出了祝贺团和代表团，为进一步振兴和开发贡山独龙族怒族地区的经济，带来了很多有价值、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与此同时，贡山县委、县政府也在总结和展示以往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对开发利用独龙族地区丰富的多种资源作出了多方面的规划。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在邓小平理论与党的十五大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人口较少、社会经济发展较滞后的兄弟民族之一——独龙族，也将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二、周总理与独龙族人民

一个民族的族称与命名能和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联系在一起，这在我国 56 个兄弟民族中不仅是绝无仅有，而且在古今世界民族中,也是不曾多见的,然而,这件事的的确确就发生在当时人口尚不到 4000 人的独龙族兄弟同胞身上，并一直成为祖国民族大家庭极其难忘和珍贵的一桩往事。

本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我们两次踏进遥远的独龙江河谷大地,从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特别是拍摄《独龙族》电影时,为能历史地再现解放前独龙族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父系家族公社解体时的真实面貌，摄制组聘请了孔志清（当时他担任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第一任县长）担任摄制顾问，并决定将拍摄重点选择在孔县长的老家——“ 孔当村 ”;这样一来,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和机缘与孔县长的家族和家人朝夕相处，时间一长，彼此间融洽得好像一家人似的。

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劳累了一整天的摄制组来到孔县长家，围坐在温暖的火塘旁，一边品尝美味可口的酥油茶，一面聆听老人们讲述独龙人祖辈的往事……当在座的同志有人猛然问及独龙族名称的由来时，借助火塘里的火光，从孔县长极其严肃和抑制不住极其兴奋的脸上，预示着必然又会有一段令人振奋和难忘的往事,果不出乎所料,就在他长长吸足一袋烟,沉吟了许久后,向我们讲述了当年他在出席中央民委扩大会议过程中，如何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周恩来总理如何亲切关怀每一个出席

会议的各族代表，临到周总理和他握手说话时，周总理又是如何为独龙族正式更名的……,下面就是彭兆清(怒族)同志,根据孔志清县长那天晚上的叙述回忆重新整理后，刊载于《怒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有关孔志清口述《我最难忘的事》摘要：

1951 年，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让我上云南民族学院学习。在学习快要结束时，上面通知说：中央不久就要召开中央民委扩大会议，要各个民族都派代表参加。因为我们在民族学院学习，而且大都是各个民族的上层人物，这样我被推选为出席中央民委扩大会议的代表,我们怒江的代表,是由张旭(碧江县县长)负责带队去的。

1951 年底,我们从昆明出发,乘火车到遵义,从遵义坐汽车到重庆，再由重庆乘轮船到汉口，然后由汉口上火车到达北京。我们到达北京后，几乎每天每夜、时时刻刻都沉浸在激动和兴奋之中。

这次会议，开了十五天。由董必武同志主持，会议期间，还组织大会发言。我们怒江代表中，我和福贡县的霜耐冬都发了言。我们大家都殷切请求见一次毛主席。经领导向上汇报后，我们的愿望终于得以实现。

1952 年元旦那一天晚上。上面通知要我们七点前到中南海，晚上八点，毛主席要接见我们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各民族代表。听到这一消息，我们大家都万分高兴，不少人高兴得流下了泪水。

七时，我们到达指定地点。几分钟后，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敬爱的毛主席满面红光地一步步走向我们。这时，雷霆般的掌声欢呼声阵阵响起。毛主席走上台子，向各民族代表挥手致意。毛主席身旁，站着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记者们跑来跑去的拍照，忙得不可开交。而我们

个个都呆了似的，看着毛主席和这么多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神，泪水模糊了双眼，幸福占满了心田，我们忘了一切，都希望时间停住不要过去，好让我们把敬爱的毛主席看饱看够。

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时刻。就是死九次十次，也不会忘记这一天。

接见结束后，是联欢晚会。有什么节目，演出效果怎么样？我一概记不清了。只是记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来参加了联欢活动。

那天晚上，我回到住地，人躺在床上，但一点睡意都没有，眼睁睁地一晚上睡不着觉。我想了很多很多，也想得很远很远，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回到遥远的故乡，回到那个不堪回首的辛酸岁月。

旧社会，称我们为 狨子或曲子，从不把我们当人对待。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世代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独龙人，才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才第一次拥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力。如果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就没有我们独龙人的今天。如果没有党的民族政策，要想上北京见党和国家领导人，简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

另一件最难忘的事情是：1952 年元旦后一天，上面又通知说：明天周恩来总理要接见我们各族全体代表。这个消息一传开也群情激动，个个手舞足蹈，高兴至极。

当晚，我睡在床上，心里像煮沸的开水一样不能平静。心想：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百忙中，还要接见我们各民族代表。我作为独龙族的第一个代表，第一个上北京的人。假如总理问起我的民族，我该如何回答？我为此彻夜不眠。

第二天早上八点左右，我们全体代表都集中在礼堂

里，不一会儿，穿一套黑色毛制服的周总理从大门徐徐走进来，依次同每一个代表亲切握手问候，问姓名，来自哪一个省，是哪一个民族的代表。总理走到我的身边时，他伸出双手紧紧握着我的手，问我叫什么？从哪里来？我高兴得热泪盈眶，回答总理说“：总理。我是从云南最边远的独龙江来的。”我想了想，继续对总理说“：旧社会，别人都把我们当做野人对待。汉族人称我们是狳子，倘狭，或叫俅人，傈僳族喊我们为俅帕。”

总理问我：“那你们民族是怎样自称的？”我连忙回答：“我们历来都自称是独龙人。”总理听了当场就表态说：“你们就按自己的称谓叫独龙族好了，再不能用其他民族的称谓了。”

这时，有西南局的领导王维舟同志在场，周总理就对他说：“老王同志，该民族的族名就按他们自己的意愿叫独龙族吧。其他民族，从今后，一律不准使用带有侮辱性的称呼。”

听到这里，我的心热得滚烫了，嗓子哽咽不知说什么才好，在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我们世世代代被唤做狳人的独龙人，第一次以本民族的意愿，使用了独龙族这个族称。这标志着少数民族的新生，那个被人欺压侮辱和受奴役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

参观开阔了我们的视野，看到了边疆和内地的差距，也增强了我们努力建设边疆的信心。

1956 年，我们独龙族聚居的贡山县，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成立了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而我，却出乎意料地被选为自治县的第一任县长。经过近三十五年的建设，贡山，这块昔日贫困落后的穷山区，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工农业生产蓬

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边疆安定　民族团结，经济发展出现兴旺景象。

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通过改革开放,贡山的建设事业会更加前途无量。

三、烟海寻踪探族源

独龙族,在祖国民族大家庭中是人口较少的成员之一,鉴于诸多的历史局限，尽管古代文献没有对它作过系统的记载，但从浩瀚纷繁的古籍和民族民间口承文化的传播中，也还不时能发现和捕捉到它的历史踪影和发生、发展、演变的轨迹。

语言,是识别一个民族及其族源十分重要的标志之一。据我国有关民族语言学专家经过大量科学调查、取证表明，凡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各民族，都与我国古代氐羌部落集团有密切的关系，“独龙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孙宏开《独龙语概况》,民族语文 1971 年第 4期),因而，独龙族先民也应该是古代氐羌族群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若从地理分布及其与之关系较紧密的怒、藏、景颇、傈僳等族所活动的地域、经济文化的相互联系来分析考察，独龙族的历史沿革，也只能从整个地区范围内去识辨其先民的发展梗概。也就是说,自汉代在西南夷地区设益州郡、永昌郡以来,独龙江、怒江流域这一带地区,也应属当时嶲唐(今保山)、不韦(今保山南部施甸一带)二县管辖的范围,从那时起,包括独龙族先民在内,这一带地区的各少数民族便与中原的封建政权发生了政治关系。在唐、宋两代属“南诏”“大理”地方政权管辖。在此期间内,尽管从汉文史书上很难找到专门涉及对独龙族的明确记载，但也可以从记述这一时期中，通过对同一分布地区类似民族的古称，找到某些值得探寻和重视的线索，以便能为进一步研究独龙族人民的上千年的历史，提供一些较为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科学佐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由樊绰所撰之《云南志》(即《蛮书》)是唐代著述有关云南之专著，也是研究南诏史最重要的典籍之一。书内之“云南城镇第六”(即卷六)有这样一段记述“：镇西城南至苍望城,临丽水,东北至弥城，西北至丽水渡…管摩零都督城，在山上……南诏特于摩零山上筑城…凡管金齿、漆齿、绣脚、绣面、雕题、僧耆等十余部落。”有关这一段之历史地理考释，国内从事西南民族研究之著名学者，先后均作过与现今独龙族地理分布十分密切的考证。如方国瑜先生在《云南志校补》(见《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十一辑第 89—90 页)中指出 樊绰所指‘ 摩零都督城,此城为边境重镇,为滇西节度管辖,应在镇西城(即今盈江城)以西冲重之地… ’鉴于‘ 蠻莫(即今八莫)之地理位置实为重要,南诏设重镇于此,亦属可能,因镇摄寻传、祁鲜之地也。 ”这正与南诏德化碑所载之“西开寻传，禄郸出丽水之金”和《元一统志》载“：南诏于此置丽水节度 ’是相符合的。据方先生考证说“；设丽水节度即统辖寻传之境,故丽水亦名寻传大川,丽水城亦名寻传大川城也。’又说“：按樊志卷二‘ 丽水一名禄郸江 ’ ,丽水即伊洛瓦底江，盖其上源名禄郸江也。江之上源为迈立开与恩梅开二江。恩梅开发源于察隅,最远为伊洛瓦底江之主流,称禄郸江,故与迈立开江合流为伊洛瓦底江，亦称禄郸江也。 ”现今独龙族之分布区,亦约当东经 98 度至北纬 27 度之间，而独龙江流域之下游，也正是恩梅开江与迈立开江合流之伊洛瓦底江。这一地理位置也符合《蛮书》所载高黎贡山以西“；镇西 ”“ 蛮莫 ’以北和察隅以南这一大范围正是当年丽水节度统辖之境。对于其管辖区内称之为“金齿 ”“ 雕题 ”“ 僧耆 ’等部落,向达先生在其《蛮书校注》一书中,对“ 僧耆 ’有这样的按语“：其实僧祗、金祗、僧耆、层期,俱是一字之异译，所指为一种黑人。唐、宋书中之僧祗或僧耆，皆是 ‘Zangi’一字的同名异译，殆皆来自非洲东岸……不过此处之僧耆部落疑指怒江上流之一种侏儒族而言，与非洲东岸之僧耆无关，樊氏仅取当时通行之一名称从各怒江上流之一种族耳。 ”综上所述，无论就解放

前有关史书对这一带的记载，或是通过解放后的实地调查，约当这一经纬度分布区“常为人掠卖为奴”的土著民族正是古今独龙族人民真实生活的写照。如《怒俅边隘详情》所载：“察瓦龙…深知各江风气，遂定以牛买人，每一人黄牛给与三条，毛牛只给二条，勒令上江百姓，领牛为之买人，以充奴婢，百姓畏其霸恶，不敢不依，辗转购置，直至狄子、脱落各江，以此各江百姓，受其笼络，只图有牛享众，不顾欠债日多，迨受逼迫，强悍者每将懦弱者一家大小捉交察蛮，以偿牛债，或杀其强壮，捉其弱小以偿。此等事无岁无之，尤为各江第一惨状”。国内外对这一分布区的土著民族也有“女子有纹面习俗”：上江女子头面鼻梁上下唇，均刺花纹”；女子嘴唇上更刺有须形的花纹”；满脸皆以刺刺小孔，涂以黑色，便成花纹以为美观”。《道光云南通志》所载：“俅人居澜沧江大雪山外…其居处结草为庐，或以树皮复之”，或“房屋系随结竹木，盖以茅草。”从以上记载来看，《蛮书》所指的“僧耆”部落，无论后来称之谓“独龙”、“德鲁”、“俅人”、“俅子”或“仙子”，都是指分布于同一地理范围内的独龙先民。如果再从与今之独龙人民同样遭受察瓦龙藏族土司“掠卖为奴”，保有“纹面习俗”、“巢居”等有关生产生活情况来分析，可见早在距今一千多年前，樊绰所指之“僧耆部落”，即为世代繁衍生息在这一地区的独龙族人民。

元、明、清三代为丽江木氏土司和丽江路军民总管府的辖地。在这一时期中，从有关汉文史书上，已开始出现有独龙族的记载。如：《元一统志》丽江路风俗条说：“丽江路，蛮有八种，曰磨些、曰白、曰罗落、曰冬闷、曰峨昌、曰撬、曰吐蕃、曰卢，参错而居”。元代的丽江路包括今丽江地区、怒江州和迪庆州南部，其西北与今西藏相接。而“撬”、“吐蕃”、“卢”，正是在丽江路的西部和西北部“参错而居”的独龙族、藏族和傈僳族的先民。“撬”为“俅”字的同声异写而已。解放前，俅(撬)族居住地区的河流称为俅江或俅夷地，今贡山县西部的独龙江上游仍称俅江。元代记述的俅（撬）族正是分布

在俅江流域一带，然后逐渐南移至下游的独龙江流域一带。从一个民族居住地相应稳定的特点分析，在《元一统志》上对居住在俅江流域一带‘撬’族的记述,正表明早在元代以前,独龙族的先民就已活动在这一带地区了。明代的正史上，虽未发现有关独龙族十分明确的记载，但这并不意味“撬”的先民在原已分布的区域内消失了。

如明代朱孟震所著之《西南夷风土记》一书中，对民族种类有如下记载：种类,曰阿昌、曰百夷、曰老缅、曰蒲人、曰焚人、曰剽人、曰杜怒、曰哈剌、曰古剌…曰安都鲁,曰牛哒喇…曰赤发。野人女多男少，盖西南坤极也……男女无贵贱，皆穿耳徒跣，以草染齿成黑色‥，…迁徙不常……上下以布围之……”从此书所记迤西与缅甸相接壤的地理环境、民族种类中所列举的“杜怒”“安都鲁’和“赤发”等称谓以及相应的习俗，都可以从中找到与独龙先民有关的联系。到了清代,从道光《云南通志》卷一八五转引《清职贡图》有如下的记载：俅人,居澜沧江大雪山外,系鹤庆、丽江西城外野夷。其居处结草为庐，或以树皮覆之。男子披发，着麻布短衣裤，跣足。妇耳缀铜环,衣亦麻布…更有居山岩中者,衣木叶,茹毛饮血,宛然太古之民。俅人与怒人接壤,畏之不敢越界。’这一段记载,对当时尚处于较原始落后的发展阶段的独龙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作了较为真实的反映。与此前后,对独龙族类似的记述,在雍正《云南通志》、乾隆《丽江府志略》等史书方志中,也都可以找到相互印证的史料。在这段时期内，清朝统治者曾将独龙江与怒江各分两段，同受丽江木氏土司知府所属的康普土千总和叶枝土千总管辖。这可从清代余庆远《维西见闻录》记载中得到十分明确的印证。

此外，结合对费孝通先生《关于我国的民族识别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0 年 1 期)一文中有关‘藏彝走廊’的学习体会,笔者曾写了一篇专门探索有关独龙族族源的文章——《〈蛮书〉的滇藏古道与‘僧耆’‘侏儒’的族属》(《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1.1)。费先生的文章指出：这条走廊正处在彝、藏之间,沉积着许多现在

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贵的园地。它们共同向我们民族研究工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我们应当进一步搞清楚这整个走廊的民族演变过程。”费先生接着又形象生动地把这一“走廊”比之为“有点像下围棋”的棋盘，只要“一旦串联起来”，就可达到“一子相联，全盘皆活”的效应。这里，结合多年从事与滇藏交界地区有关独龙等族的调查研究，从探索《蛮书》上早已提到有条从云南向西入藏的通道入手，联系向达先生在《蛮书校注》里对“僧耆”“僧耆部落”等究竟应是当代哪一个民族的先民以及它和“居住在察隅和珞瑜的许多民族……说着和今独龙语相近语言的人的后裔”又是指的是什么民族等等，作一点寻根溯源式的学术探讨。

在费孝通先生《识别》一文中指出：“这个地区(即指察隅)原本和怒江流域只有一山之隔，而且早在唐代，樊绰的《蛮书》里已提到过有条从云南向西的通道。现在正需要我们识别的居住在察隅和珞瑜的许多民族有可能就是早年从这条通道进入这些地区的说着和今独龙语相近语言的人的后裔。”从史书记载和通过实际调查，所谓“一山之隔”其一即可能指的是高黎贡山(《蛮书》上一名“高良公山”或“高黎共山”)……除以上对《蛮书》的“僧耆”，联系“俅人”“俅子”的地理分布、社会文化习俗特征，作了对照和对比探索外，这里，再通过对解放前移居缅甸北部的独龙人所保留的许多类似的特征，也可以从另一侧面进一步印证，《蛮书》里所写早在唐、宋时期就分布在这一带的“僧耆部落”，实际就是今日独龙族之先民。

《民族译丛》1981 年第 5 期曾发表孟达的一篇文章《缅甸的独龙族》，该文指出：“在缅甸的北部山区里有一种人数不多，但类似非洲的俾格米和安达曼群岛、马来群岛和新几内亚岛一带的尼格利陀的小矮人，他们叫独龙族……独龙人居住在缅甸北部克钦邦的最北端……七十多岁的独龙族老首领舍拉官介绍说，他们的祖

先原来居住在中国云南省独龙江一带，故得名独龙族。他们祖祖辈辈安居乐业定居在那里……他们被藏族土司当奴隶贩卖，被抢占的妇女如不遂心还被杀死，独龙族的首领们决定对邻部反击，但终因寡众不敌,不得不远逃,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最后越过中缅边界终年积雪的天然屏障达拉纳卡（即担当力卡山）山口,到达缅甸。独龙族到达了人烟稀少的新环境以后,仍深居简出，长期穴居窑洞或是在深山密林里移动……”1962 年经过缅甸派出医疗考察组对 68 名独龙男女检查测量表明：独龙人“男性平均身高为 1.47 米,最矮的为 1.31 米，最高的为 1.59 米;女性身高在 1.19 米～1.585 米之间,平均高度是 1.39 米。非洲的俾格米人的身高在 1.37 米～1.45 米之间……缅甸的独龙人和他们不相上下。’(《民族译丛》1981 年第 5 期）从这一段译述中可以看出，居住在缅甸北端的这一部族与独龙人，是由于不堪藏族土司的压迫欺凌而被迫逃迁缅甸的。值得注意的是，文中提到的“天然屏障达拉纳卡山口’的地理位置,受藏族土司欺压‘被当奴隶贩卖”;‘长期穴居窑洞”(应为岩洞)和‘独龙人个子矮小’等记述,都与《蛮书》中所引‘僧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就是说,通过对解放前逃居缅甸北部这一部分独龙人种种相类似特点的对照，也可以从另一侧面更加进一步印证,《蛮书》里所载在唐、宋时期就分布在这一带的‘僧耆部落”,实际上就是今日之独龙族。综上所述,然后再回过头来联系《蛮书校注》对这种民族之记述:‘此种人男人高约四英尺六寸左右,妇女高约四英尺二寸左右。身上刺绣花纹。在一九一一年以前,此种人之买卖集中于北纬 29 度,东经 98 度之 Menkong （即门工）地方”(向达《蛮书校注》卷 6),不难看出,无论就察瓦龙藏族土千总对独龙人‘强掠人口,永做奴隶’的实地调查,抑或是‘察瓦龙遂定以牛买人”;‘勒令上江百姓,领牛为之买人,以充奴婢”;‘强悍者每将懦弱者一家大小捉卖为奴”等记载，均可证实这种民族，都指的是独龙族。

以上对独龙族族源的追溯与探讨，仅只作为个人学习研究的一管之见、一家之言。尽管这一观点和立论，已为国家民委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之一的《独龙族简史》所引用和认同，迄今未见商榷否定的文章，但这并不表明上述的观点就是结论。为此，仍希望对独龙族族源问题有兴趣研究的同志们，继续为之探索与论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